

# 论散文的文化本体性

陈剑晖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1)

**摘要:** 本文从文化学的角度对散文的文化本体性问题进行了论述, 探讨了散文与人类文明进程的关系, 散文的文化类型、文化气质和文化内涵, 散文的文化本体性与审美性的融合, 以及在新的世纪里, 我们应如何塑造散文的文化主体等问题。

**关键词:** 散文; 文化本体性; 文化

**中国分类号:** I056      **文献标识码:** A

散文的文化本体性问题, 在过去的散文研究中一直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拟从文化学的角度, 探讨散文与人类文明进程的关系, 散文的文化类型、文化气质和文化内涵, 散文的文化本体性与审美性的融合, 以及在新的世纪里, 我们应如何塑造散文的文化主体等问题。

## 一

如果仅仅说中国散文是中国实用文化的文学化、通俗化的记载转述, 那显然是不够全面的。实际上,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除了占主流地位的儒家哲学外, 还有以“道”为核心的老子、庄子的哲学文化和体现这种“无为”、“无争”、“无待”思想的大量散文。在批评观念方面, 除了儒家的“文以载道”, 还有道家的“文以气为主”的“气韵说”, 等等。此外, 中国文化强调“中庸之道”, 推崇“中和之美”, 注重整体结构的和谐与均衡, 追求真善美的人生境界, 这种颇具东方色彩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 也在中国散文那里引发了绵延不绝的回声。惟其如此, 中国散文虽然在探索宇宙、思索人生、灌注生命意识和理性精神上不及西方散文, 但中国散文由于源远流长, 又兼承了中国文化的精神, 故而它虽然发展缓慢, 却平稳扎实, 不仅时有高潮, 而且经久不衰。

除了上述两方面, 中国文化和中国散文的密切关系, 还体现在人的情感和心灵的层面上。辜鸿铭说过, 中国人因其粘液质而不善思辨穷理, 这使得中国人有着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 他们倾向于过一种情感的和心灵的生活。<sup>[1]</sup>中国人的这种轻理性思维、重感性、心灵和顿悟的文化心理特征, 在庄子、苏轼那些纵横捭阖、想像瑰丽的散文中已表现得大气淋漓, 而在被称为“独抒性灵”的晚明小品那里, 这种散文与文化的融合又得到了发展。晚明小品虽有对现实黑暗的揭露, 但更多的是闲适恬淡的人生况味和幽静淡远的田园自然风光的描绘。晚明的散文家崇灵尚趣, 追雅求幽, 总的创作倾向是由“文以载道”转向自适消遣。晚明性灵小品的这种美学风范, 一方面受到当时日益奢侈的城市风俗和日常生活中追求繁华享乐倾向的影响; 另一方面也打上了当时士大夫隐逸与参禅, 即借求佛问道, 游山玩水, 以及清谈人生达到明心见性、自觉自解的情感和心灵的烙印。由此可见, 中国文化和中国散文有着一种奇妙的契合: 中国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散文的内容和艺术特征; 中国散文反过来又传达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所以我赞同这样一种说法: 中国散文“是中国文化在我们民族精神产品中的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是中华民族在其特定的文化历史中积淀成的一种经验形式”<sup>[2]</sup>。

以上侧重从哲学思想、文化取向和心灵感受等方面来考察古代散文和中国文化的联系, 如果我们的眼光前推, 考察自“五四”以来中国散文的发展历程, 我们会进一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在

20世纪中国散文的发展史上，无论哪一个时期，只要散文与文化结了缘，则这一时期的散文一定兴旺发达；反过来，只要哪一个时期的散文与文化脱节，那么这一时期的散文便难逃苍白浅露乃至萧条凋零的厄运。五四时期的散文为什么会那么繁荣，各种样式、各种流派齐备，即朱自清先生说的有记述，有描写，有讽刺，有劲健，有绮丽，有含蓄，还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因为五四散文小品与传统文化有着极为深刻的渊源关系，它继承和借鉴了古代散文特别是晚明小品的养料，又有所突破和发展。同时，那时的散文家又接受了西方的文化包括西方的现代意识，他们在“人的文学”的大旗下，通过散文(当然还有其他的文学样式)重铸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性格。正是在“双重文化”的渗透下，五四时期的散文才成为中国现代散文的第一个高峰。而20世纪30年代后期到70年代这段时间，中国的散文却每况愈下，最后几乎走进了死胡同。有的认为是严峻的现实生活扼杀了散文的生命，有的认为是“写中心”、“赶任务”、“歌颂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使散文偏离了本体，有的则将当代散文的走下坡路归咎于当年倡导“诗化”和“形散神不散”的理论主张。对当代散文的这些诊断都不无道理。但在我看来，当代散文在很长时间里整体思想质量的下滑，最根本的原因是失去了文化的根性。由于没有文化的强大依托，缺少文化血液的涵咏滋润，散文自然也就没有内蕴，便不可能走向精神上的开阔与深沉。试看被《中国当代文学史》誉为当代散文“三大家”的杨朔、秦牧、刘白羽的散文，因为他们散文的总体基调与文化本体相背离，所以尽管他们的散文在记叙描写中不乏艺术性，甚至还透出一种“诗意”的美，却因内容的失真和欠缺文化的内蕴，最终受到了读者的非议与弃置。与此相反的情况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散文又出现了五四散文那种“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繁荣景象。这其中有经济转型、社会心理和审美风尚转变等等原因，但不容忽视的一个事实，是20世纪90年代当代散文的文化品位提高了，文化内涵比以往丰厚了，这种文化“增值”的结果是，当代散文相应地增加了思想艺术魅力。这一点不仅从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广受欢迎便可得到印证，也可以从所谓“老生代”散文的走俏获得启示。由于以张中行、金克木、季羨林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先天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加之他们独特的人生经历和丰富的人生智慧，而为文时又能摆脱“文以载道”的束缚，以自适随意和平实恬淡的语体表达他们对于现实的褒贬和人生的感悟，这样他们的散文随笔自然也就为读者所钟爱。“老生代”和余秋雨等的“大散文”启示我们：散文要丰厚，不能没有文化；散文要耐读，不能没有文化；散文要摆脱庸俗浅陋，更需要文化的定力。

## 二

论及散文的文化本体性，我们不能不谈到文化散文的类型。散文的文化类型，可分为地域文化散文、宗教文化散文、伦理文化散文、哲学文化散文和科学文化散文等等，在诸多文化散文类型中，地域文化由于最具恒定性，同时维系着人类那条最柔软、最美好和纯真的神经，因而地域文化意识最能够体现出散文文化本体性的底蕴。

散文作家与特定地域的关系，这是文学研究的一个老话题。由于作家出生或常年生活于某一地域，对该地域的山川景物、风土人情、信仰习惯、价值观念和心理结构特别熟悉，即使有的人后来离开了故乡，但故乡的山川人文仍然潜藏于他的创作意识之中，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空间的转换，故乡的风物人情在作家的脑海中会越来越鲜明和美好，这方面有许多作家的优秀作品可作佐证。比如汪曾祺，他大半辈子都在北京度过，耳濡目染了北京文化的精妙，于是他写了《胡同文化》这篇散文，不仅准确地描写了胡同文化的特征，写了北京市民的文化活动以及胡同居民爱瞧热闹不爱管闲事的性格，更通过胡同的记叙描写批评了一种封闭保守的文化，即北京下层市民安分守己、逆来顺受、自我满足和忍耐屈从的性格特征，而这，正是胡同文化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衰败和没落的原因。汪曾祺写北京的胡同固然精彩，他写故乡高邮同样透出浓郁的文化气息，请看他的《故乡的食物·端午的鸭蛋》：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高邮大麻鸭是出名的鸭种……高邮咸鸭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高邮咸蛋的油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菜，叫做“朱砂豆腐”，就是用高邮鸭蛋黄炒的豆腐。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蛋黄是浅黄色的，这叫什么咸鸭蛋呢！在《故乡的食物》系列中，汪曾祺还写到故乡的“炒米和焦屑”，写到河里的虎头鲨、昂嗤鱼、碎蟹、螺狮、蚬子，写到野鸭、鹌鹑、斑鸠等野禽，还写到

枸杞、芥菜、马齿苋等野菜……汪曾祺如数家珍，以散淡然而又有情有味的笔调向读者介绍他的故乡的风味吃食和风俗民情。事实上，他是在吃食和风俗民情中，抒发着他对故乡的思念与挚爱，以及寄寓着他对世事人生的感叹。我们知道，“民以食为天”。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方面崇尚和谐，以静为本，以“和”为贵；一方面顺应人情，重视常识，讲究日常的生活经验，体现了一种享受现世的乐观精神。汪曾祺写故乡、谈文化的散文正是体现了这样的一种文化心态——一种植根于农业文明的淡泊自然、雍容宁静的久违了的士大夫情趣。从这一点看，汪曾祺是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表现方式和精妙之处的。当然，如果以“题材决定论”的标准来衡量，汪曾祺的散文则是不那么“够格”的，因他描叙的题材过于琐碎平常，既见不到时代风云的激荡，也没有一唱三叹的抒情，但倘若从文化本体的角度来评人衡文，则汪曾祺的散文无疑是上乘之作。汪曾祺在《〈汪曾祺小品〉自序》中认为，好的散文小品应有三个特征：一是“带有文化气息”；二是“健康的”；三是“悠闲的”。这三个条件是汪曾祺散文创作的前提，也可以说是散文的“文化本体性”的最好注脚。正因为具备了丰厚的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内涵，所以即便不写重大题材，不去表现人类的永恒主题，汪曾祺的散文仍具有超越地域和时间的价值。

在表现地域的文化意识方面，有特色的散文作家除了汪曾祺外，还可列举出贾平凹、刘成章、素素等。比如贾平凹，尽管他和汪曾祺一样都深受传统文化特别是晚明“性灵小品”的影响，在审美情趣上都倾向于自然淡泊和谐和空灵的境界，但贾平凹毕竟常年生活于秦地，故而他的《秦腔》、《商州初录》、《五味巷》写西北的山川地理、人文风物、风俗习惯又别有一番风采。刘成章的《安塞腰鼓》、《压轿》、《转九曲》等散文，也有着十分浓厚的陕北地域文化意味。此外，像素素的“东北独语”系列也颇具文化色彩。如《移民者的歌谣》由东北的“二人转”转到移民张代五家，又由张代五家写到整个东北的移民身世；《烟礼》写了东北人爱抽烟的习惯和独有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黑颜色》则通过张作霖和座山雕的考察，对东北的土匪文化进行了分析。素素的这些散文，既折射出东北地域文化的特质，又有着她的真切的生命感受，这使她的散文不仅具备民间的意味，且透出厚重的历史感和宏阔的空间感。

如果说，地域文化色彩以及特有的自然景观、风俗人情、历史细节和童年回忆常给散文以滋润，那么，宗教文化意识则是从人类普世关怀的角度折射出创作主体的心灵质量和精神向度。如众所知，中国并非一个宗教氛围十分浓厚的国度，但这并不表明中国的文学与宗教没有密切的联系。远的姑且不论，仅就五四时期的作家而论，鲁迅、周作人、郑振铎、许地山、郁达夫等作家，都或多或少在作品中涉及到宗教性体验。而就散文创作来说，现代文学史上也同样留下了不少带有佛意禅理的散文名篇。比如郑振铎的《大佛寺》、叶圣陶的《两法师》、俞平伯的《独语》、郁达夫的《花坞》、弘一的《最后之忏悔》、丰子恺的《还我缘缘堂》、《无常之恻》等，这些散文，或以宗教故事作为散文创作的题材，或以佛教文化作为参照来思考中国新文化的构建，或借助故事与人物渗透进某种宗教性的体验。但不管如何，作家在创作这类散文时都有一种平和与宽容的心态，因此我们阅读这类作品时也就有一种亲近和纯净之感。遗憾的是，当历史进入到 20 世纪中叶之后，在大一统意识形态的规范之下，散文中的宗教文化意识几乎丧失殆尽，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到 90 年代初，宗教文化意识才又在散文中复苏。其代表作家是贾平凹、张承志和史铁生。贾平凹的散文之所以在上世纪 80 年代拥有大量的读者，甚至连颇为挑剔的三毛也为之倾心，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散文中透出一股佛境禅味。他的散文喜欢选择月、石、水作为描写对象，这里既有作家审美的偏爱，更有他对于禅宗的虚、静、空境界的追求。在《夜游龙潭记》里，他写道：“四面空洞，月光水影，不可一辨。桨起舟动，奇无声响，一时万籁俱寂，月在水中走呢，还是舟在湖山移，我自己早已不知身到了何处，欲成仙超尘而去了。”贾平凹的《月迹》、《月鉴》、《坐佛》、《钓者》等一大批散文，大抵都有佛教的空灵超脱和禅宗的幽趣。与贾平凹在散文中追求“平常心”、寄情于山水不同，张承志散文中的宗教情绪是狂热、孤傲和偏激的。这种决绝的“精神圣战”虽能给人以心灵的震撼，但其破坏性也显而易见。因此，我更欣赏史铁生散文中的宗教。那是一种从个体的苦难和人类的困境出发，在沉思冥想中将自我融进天地万物，同时能够与上帝对话宗教的精神：一方面，他认同宿命，听从上帝的安排，并由此产生了深深的感伤迷茫；另一方面，他又渴望在精神上超越苦难，希望通

过感悟能“识破”上帝的诡计，并在“识破”即追求和创造的过程中体现人生的价值。于是，在史铁生的散文中，宗教感既是使人类摆脱困境、激发人的情感和创造力的心理和精神依托，也是他的散文之所以通脱和深沉阔大的主要思想资源。

应当承认，在表现宗教文化方面，台湾的散文要比大陆的散文自觉和广泛。比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台湾就出现了林清玄、林新居、黄靖雅、王静蓉、李璜棣等一批自称佛家弟子的散文作家，还有琦君、张秀亚、张晓风的散文也常透出宗教的情怀。他们提倡宽恕精神，主张回归自然，心系菩提，以东方的爱心和诗性去洞照人生，洗涤心灵的尘埃。举例说，在林清玄的《佛鼓》中，作者见到燕子礼佛、游鱼出听，于是参悟到众生皆有灵性，它们懂得“时时惊醒”。那么人作为万物的灵长，理应更注重内心的磨砺修炼，使心境空灵澄明，摆脱各种名绳利锁的羁绊。在这里，作者关注的不仅是自我心灵的净化，而且深深为一个个在现代都市中活着的“死魂灵”而惋惜。事实上，台湾的许多宗教文化散文都不约而同地关注这样一个现实问题：在现代工业文明和文化工业的冲击下，在人的主体价值被肢解、精神家园正在荒芜的严重时刻，人类如何保持心灵的安定与人格的圆融，而宗教，它从来就是人类精神的守护者，是支离破碎、机械单一的当代生活的粘合剂。正是因此，台湾的散文作家将宗教作为拯救自我、进而普度人类的良方，这固然多少有点无奈，但它确实使台湾的散文创作获得了较深广的文化意义。

上面我较为集中地探讨了地域文化意识和宗教文化意识，除了上述两种文化类型外，伦理文化、哲学文化、科学文化也都属于文化散文的范围。伦理文化散文，主要是在创作中体现创作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伦理关系，有较浓的道德主义色彩。哲学文化散文往往是“论说式”或“絮语式”的，它在字里行间流淌着汨汨的“理”，但在“理”中也饱含着作家浓郁的情绪和个性，如罗素、卢梭的散文即是。至于科学文化散文，则是在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背景上产生的一种文化意识，它是使散文迈向“现代化”的一条主要途径。当然，散文家应在尊重散文文体特性的前提下引进科学文化意识。由于篇幅所限，对上述几种文化类型的论述在此从略。

### 三

散文的文化本体，不能狭义地理解为对某地域的自然景观、原始民情的再现，也不仅仅是文化乡愁和宗教情结之类，在我看来，散文的文化取向或文化本体的核心，应是对于民族文化精神和文化人格的重建，以及建立在此基点上的文化批判意识。只有从这样的高度来构建当代的散文，我们的文化散文才不至于“热衷于掉书袋，食古不化，泥洋不通”，不至于总是在“回忆过去，沉溺于往事之中而不能自拔”。<sup>[3]</sup>

的确，当代的散文要避免发出霉味和酸味，关键之点是散文作家要与时代的发展同步，要以自由开放的现代情怀参与到现实生活之中，要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制高点上来审视民族文化的进程和健全文化人格的构建。在这方面，余秋雨的散文颇能说明问题。尽管余秋雨的散文有过于滥情之处，同时有程式化的操作手法和史料方面的硬伤，但由于他的散文集中展示了中国文化的苦难历程，致力于构建强健的个体人格和民族的性格，加之他以学人的智慧、生命的感悟和生存的体验融合其间，在表达上，又富于激情和理性的力量，因而他的散文创作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成功，事实上也是文化的成功。这正如孙绍振先生所说，“在余秋雨心中有一种文化中心主义的史学。文化就是生命，生命就是哲理的诗学。他的一切独创的话语实际上是以文化、个体生命为本体的话语。”<sup>[4]</sup>明白了余秋雨的散文是以文化的个体生命为核心来重新阐释自然山水，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遭受了那么多的责难和攻击，广大读者依然痴心不改地迷恋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还可以看看王充闾的散文创作。王充闾过去还不太为人所知，但自从他出版了散文新著《沧桑无语》后，有人便将其称为“散文大家”了。<sup>[5]</sup>原因是，王充闾的散文不仅有知识、有学养、有感悟、有阅历，更在于他在散文创作中，将自然山水置于人文山水的层面上，在特定的历史文化氛围中解读民族文化的底蕴和中国文人的命运，同时将“诗性、哲思、历史感的结合”当作其散文创作的“一种内在追求”<sup>[6]</sup>。如在《青山魂》中，作者将李白分成两半：“一半是，志不在为诗为文，最后竟以诗仙、诗豪名垂万古，攀上荣誉巅峰”的李白；“而另一半是寤寐思服，登龙入仕，却坎坷一世，落拓

穷途，不断地跌入谷底”的李白，正是在“现实存在的李白”和“诗意存在的李白”这两个层面上，作者真切地展示了李白矛盾重重的内心冲突。他企图超越现实又无法超越，他顽强的选择命运却又终归为命运所选择。而这不正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吗？值得注意的是，像这样侧重于生命状态的呈现，展示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和命运悲剧的作品，在《沧桑无语》这本集子中随处可见，如《寂寞濠梁》、《桐江波上一丝风》、《春梦留痕》、《梦寻》、《文明的征服》等等。这些散文，都不满足于只对自然风光和历史场景的再现，而是作者对史学视野的重新厘定，是对历史的创造性思考与沟通，从而为不断发展变化着的现实生活提供一种丰富的精神滋润和生命的启示。

散文的文化本体性要求散文作家不仅要以独到的眼光对历史文化进行重新审视描绘，并在这种审视描绘中创造性地构建民族文化性格，而且，散文的文化本体性还要求作家在视通万里、思接千载的同时，还要具备现实的情怀，要有一种强烈的文化批判品格。这种文化批判品格，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二是对当下文化生活的全方位介入。关于前者，我们可以在余秋雨等散文家的作品中感受到。如余秋雨对中华民族文化人格特有的“小人”的批判（《历史的暗角》），特别是对西湖边的“隐士”林和靖的批判，说他一方面是“自卫和自慰”；一方面则是“把消除志向当作志向”，正是这种崇尚无所作为的“安贫乐道，成为中国文化人格结构的一部分，使得文化成了无目的的浪费”。这样的批判，可谓切中肯綮。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是对当下文化生活的批判。因为对所处的物欲膨胀、人欲横流的现实生活感到不满，对精神与物质的不平衡状态感到忧虑，对各种各样的文化热点和时尚感到厌倦。于是，一批富于理想主义情怀的作家便应运而生，他们通过散文随笔这种特殊的文学体裁传达出了他们对于世俗的抗争。比如张承志、张炜对“以金钱为中心的社会的种种弊病表现出了极大的蔑视。他们或则要“融入野地”，通过回归自然来进行精神的坚守；或则皈依宗教进行一场“精神的圣战”。特别是韩少功，他对当下社会生活的介入不仅全面，而且十分彻底。在坚持人本主义的价值关怀，坚持文学的声音应来自“灵魂”的前提下，他的文化批判的锋芒首先是人的精神的萎缩和沉沦。《人之四种》、《个狗主义》分析了个人思潮在中国的退化和当代人面临的精神危机，尖锐抨击了“不把别人当人，也不把自己当人的个狗主义”，而对于“安贫”而又不反对“富民”的苏东坡，他则发出了“亲切而由衷的微笑”。韩少功不仅痛惜物质对人的奴役，而且憎恶文学艺术领域中的“痞子运动”，同时他还十分警惕现代科技浪潮对人和文学艺术的扭曲。他担心“随着技术潮流的层层覆盖和层层渗透，人的面目在引退和模糊”，而在一个技术为本的世界里，“文科知识的无限增聚也可以使知识人格脱离学者人格，使大学成为精神摹本和精神假面的产地”。他还将文化批判的笔锋指向“后现代”，指出它“自己成不了什么主义，不能激发人们对真理的热情和坚定，一开始就隐伏了世俗化的前景，玩过了就扔的前景。它充其量只是前主义的躁动和后主义的沮丧，是夜行者短时的梦魇”（《夜行者梦语》）。不仅如此，他还将思索的目光投向现代人的“性而上迷失”：一方面，指出“性解放并没有降低都市男女的孤独指数和苦闷指数”；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人既不可能完全神化，也不可能完全兽化，只能在灵肉两极之间巨大的张力中燃烧和舞蹈”。由于韩少功是一个既入世又出世，既具哲人的智慧又兼诗人的情怀的作家，故而他对人性的堕落，对金钱欲、性欲，对技术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判都始终保持一种冷静而深刻的见解，表现出对人和物的罕见的文化穿透力，同时还透出智慧的魅力和思辨的色彩。除了上述几位，王小波散文随笔中的文化批判也相当出色。不过王小波对思想专制、愚昧野蛮和盲从盲信的批判，以及对个人的体面与尊严、自由、平等的倡扬常常伴随着“佯谬”的推理方式，这样他的文化批判往往在漫不经心中达到出人意料的效果。

#### 四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散文的文化本体性应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题材和感情倾向上的文化性，即所写的社会人事或自然景观蕴含历史丰富的文化内涵；二是有强烈的文化反思精神，即通过浸润着文化意味的特定对象反思历史和人类的生存景况；三是文化的批判意向，即以独具的文化视野和思维方式来剖析描写的对象，穿透事物的本质，从而使散文达到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超越。不过，鉴于近年来文化散文有过于泛化的倾向，在这里我想谈谈散文的文化本体性与审美性的问题。

散文的文化本体性与审美性不是分离的，更不是对抗的关系，而应是知性与感性的交融，是文化理性与审美诗性的完美结合。当今的散文创作要有较大的思想内涵和艺术魅力，一方面要注入文化的内涵，不仅要表现出一定的文化色彩，而且要将文化底蕴作为作品的内核和依托；另一方面，在强化文化素养和文化精神时，又不能忽略艺术的审美创造，给作品注进生命的情调和色彩。惟其如此，当代的散文才有可能走向大气和成熟。令人感到不足的是，时下的不少所谓“学者散文”或“文化散文”，都或多或少存在着重文化而轻审美的创作倾向。这些散文随笔或则热衷于“文化旅行”，写了秦砖汉瓦唐风宋雨，惟独缺少深层的文化理解和情趣的灌注；或则满足于史料的罗列和知识的炫耀，或在散文中进行学术论文式的逻辑推理，这样为文化而文化，以学问知识代替艺术审美的做法，自然只能凑出一篇篇貌似高深实则平庸的文章，而不可能创作出真正具有文化本体性的优秀散文。

除了忽视审美性，当今的文化散文还有一个弊端，这就是一些作家在创作时总是用一种不变的、凝固的眼光去看待文化，有的甚至表现出相当落后、保守的文化意识和文化观念，这样同样无法熔炼出属于自身同时又顺应时代发展的具有崭新文化内涵的作品。须知，人类文化不是一片荒凉的残墙断垣，不是永远不变的化石，而是一种鲜活的、不断发展着的生命形态，是一条不息流动着的河流，它总是随着历史的演进和时代的需要不断抛弃一些东西，同时又更新一些东西。既然文化总是随着时代生活的发展不断更新内涵，那么当代的散文创作也应随着文化的变化而发展变化。也就是说，散文作家在创作时，要以崭新的文化意识来观察生活、处理题材、思考和分析当代和古代的文化问题。在这方面，当代的一些优秀散文家已经作出了成功的实践。如金克木在《〈论语〉中的马》中，既对“马”的形象进行了细致的考证梳理，引发出对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诸方面的文化思考，又阐发了西方的科学主义和理性精神，从而将儒、释、梵的内容寄寓于现代文化精神的不断探索之中。王小波的散文，则常常是通过古代的典故或民间故事来展开他的“佯谬”式的推理，但他的文化背景却是西方强大的科学理性精神，这样他的文化批判便有着别的作家所不及的幽默色彩和文化深度。事实上，无论是金克木还是王小波，他们的散文都在不同程度上扩大了散文的思想容量，拓展了中国当代散文的写作模式。

的确，中国的当代散文正从以往的托物言志、抒发感情的狭义范畴向着更广阔的生活领域蔓延渗透。它告别了以往的简约、古典和幽雅，却在历史的穿行和人生的感悟，在慵散与平凡的日常生活情景中营结出一个个的公共文化空间。它没有诗歌的极端和尖锐、绝对的精神强度和感情的激烈，却充满着心灵的私语和闲适的机趣，而且有着秋天的宁静与辽阔。是的，当代的散文因了文化的浸润而获得了本体性，而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乃至整个民族的心理素质、审美情操和精神境界，则有可能因散文的文化本体性的强化而得到全面的提升。

#### 参考文献

- [1] 辜鸿铭. 中国人的精神 [M].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6. 32、383.
- [2] 汪帆. 新时期散文论集 [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0. 2-3.
- [3] 陈剑晖. 论 90 年代的中国散文现象 [J]. 文艺评论, 1995 年, (2).
- [4] 孙绍振. 余秋雨. 从审美到审智的“断桥” [J]. 当代作家评论, 2000 年, (6).
- [5] 吴俊. 散文大家王充闾 [J]. 当代作家评论, 2000 年, (1).
- [6] 王充闾. 沧桑无语·附录 [M].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1999.

## On cultural essence in essays

Chen Jian-hui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1)

**Abstract:** This article, from the angel of culture, discusses literature essence in essays. It also discusses the relation between essays and proc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cultural category, cultural quality,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in essays, the combination of cultural essence and aesthetics in essays, and how we should mold cultural principal of essays.

**Key Words:** essays; cultural essence; culture